



农业技术经济
Journal of Agrotechnical Economics
ISSN 1000-6370, CN 11-1883/S

《农业技术经济》网络首发论文

题目： 草地流转“差序格局”与牧户超载过牧——来自内蒙古牧区的微观证据
作者： 马如意，肖海峰，高博，乔光华
DOI： 10.13246/j.cnki.jae.20240618.001
网络首发日期： 2024-06-27
引用格式： 马如意，肖海峰，高博，乔光华. 草地流转“差序格局”与牧户超载过牧——来自内蒙古牧区的微观证据[J/OL]. 农业技术经济.
<https://doi.org/10.13246/j.cnki.jae.20240618.001>



网络首发：在编辑部工作流程中，稿件从录用到出版要经历录用定稿、排版定稿、整期汇编定稿等阶段。录用定稿指内容已经确定，且通过同行评议、主编终审同意刊用的稿件。排版定稿指录用定稿按照期刊特定版式（包括网络呈现版式）排版后的稿件，可暂不确定出版年、卷、期和页码。整期汇编定稿指出版年、卷、期、页码均已确定的印刷或数字出版的整期汇编稿件。录用定稿网络首发稿件内容必须符合《出版管理条例》和《期刊出版管理规定》的有关规定；学术研究成果具有创新性、科学性和先进性，符合编辑部对刊文的录用要求，不存在学术不端行为及其他侵权行为；稿件内容应基本符合国家有关书刊编辑、出版的技术标准，正确使用和统一规范语言文字、符号、数字、外文字母、法定计量单位及地图标注等。为确保录用定稿网络首发的严肃性，录用定稿一经发布，不得修改论文题目、作者、机构名称和学术内容，只可基于编辑规范进行少量文字的修改。

出版确认：纸质期刊编辑部通过与《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有限公司签约，在《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出版传播平台上创办与纸质期刊内容一致的网络版，以单篇或整期出版形式，在印刷出版之前刊发论文的录用定稿、排版定稿、整期汇编定稿。因为《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是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准的网络连续型出版物（ISSN 2096-4188，CN 11-6037/Z），所以签约期刊的网络版上网络首发论文视为正式出版。

草地流转“差序格局”与牧户超载过牧*

——来自内蒙古牧区的微观证据

马如意 肖海峰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北京 100083)

高博 乔光华 (内蒙古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呼和浩特 010010)

摘要:草地流转是否会导致牧户超载过牧,进而加剧草地退化、阻碍草原生态环境恢复,在学界存在争议。本文通过草地流转“差序格局”概念区分草地交易对象,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利用内蒙古牧区草地转入牧户的调查数据,验证草地流转“差序格局”与牧户超载过牧的关系,并进一步讨论了市场化转型与草地流转“差序格局”撕裂潜在的问题。研究发现:(1)与亲友或者本嘎查牧户等熟人相比,从外嘎查牧户或经济组织等非熟人转入草地更可能增加牧户超载过牧程度;(2)机制检验表明,草地流转“差序格局”显著正向影响草地流转租金,而草地租金的提高会增加转入户超载过牧程度,即草地租金是草地流转“差序格局”作用发挥的重要途径;(3)异质性分析表明,具有不同草地资源的牧户,草地流转“差序格局”对其超载过牧的影响存在异质性,相对于草地经营面积较小的牧户,草地流转“差序格局”对较大规模的牧户超载过牧程度作用效果更大;(4)当前草地流转市场化快速转型,加之业已出现的草地租金趋同,意味着草地流转“差序格局”将逐渐发生撕裂,并可能导致牧户超载过牧,加大草地生态环境压力。考虑到当前草地流转仍然以熟人流转为主,草地流转“差序格局”撕裂及其潜在问题应当引起相关政府部门的关注。

关键词:草地流转;超载过牧;“差序格局”;草地租金;市场化

一、引言

中国是草原资源大国,草原面积居世界第二位,占世界草原面积的12%,占国土面积的41.7%(Yang等,2021)。草地是陆地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调节气候、保护土壤、提供养分、供水调水等功能,也是人类畜牧业发展的基础。然而,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和人类长期以来掠夺式的开发利用,草地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退化,造成生产能力不断下降,严重制约畜牧业经济可持续发展,阻碍了牧户收入增长(高博等,2021;周升强等,2019)。究其原因,草地退化既受气候变化等自然因素的影响,也有人类活动对草地生态系统的过度干扰,其中,超载过牧被认为是主要的人为因素,也是政策可干预行为(王卫东等,2023)。而在众多防止草地退化的政策中,草地流转被认为是解决草畜矛盾,减少牧户超载过牧程度,提高草地生产能力,缓解草地退化,促进草原生态恢复的重要途径(苏柳方等,

* 项目来源:农业农村部和财政部“国家绒毛用羊产业技术体系产业经济研究专项资金”项目(编号:CARS-39-22),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牧区婚俗改革及其福利效应研究:基于代际支持视角”(编号:72363027),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数字技术赋能草原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研究”(编号:22XGL002),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和中国农业大学研究生自主创新研究基金项目“我国肉羊养殖户碳减排技术采纳行为及经济、环境效应研究”(编号:202321)。感谢中国人民大学谭淑豪教授在2023年中国林牧渔业经济学会年会上给予本文的修改建议,感谢编辑部和评审专家的宝贵建议,文责自负。肖海峰为本文通讯作者

2021)。

草地流转即草地经营权的流转是对草原承包经营制度的补充和完善(史雨星等,2022)。对于草地流转的研究,得到了学者们广泛关注,主要聚焦于以下方面:一是牧户草地流转行为的驱动因素。部分研究揭示了牧户个体特征、家庭特征、资本禀赋以及畜牧业经营情况等对其草地流转行为的影响(Tan等,2017;张美艳等,2017);更多研究成果基于中国农村牧区“差序格局”的人情社会特征,探究社会资本对牧户草场流转行为的影响机理(刘博等,2019;史雨星等,2022;钱琛等,2021)。二是草地流转的经济效果评价。已有研究结论较为一致,普遍认为牧户参与草地流转后总收入显著提高(高芬等,2022),主要作用机制是提升草地转入户的牧业收入和技术效率,增加草地转出户的非牧业收入(谭仲春等,2018;关士琪等,2023),但草地流转可能会进一步扩大牧户之间贫富差距(李先东等,2019)。三是草地流转的生态效应评估。逻辑上来说,对于转入户,在草地承包面积相同的情况下,草地转入能够增加牧户可利用草地面积。转入草地面积越多的牧户,供其进行养殖决策的草地规模越大,越有利于降低牧户放牧强度,更有助于改善草场整体的超载过牧情况(胡振通等,2014);对于转出户,大多数牧户会退出牧业生产,这可以有效缓解草地人口承载压力,促进草原生态恢复(孔德帅等,2016)。由此可见,草地流转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协调草场承包到户后牲畜对草地资源的需求与草地供给之间的矛盾,草地整体的放牧压力有所缓解(赖玉珮等,2012)。但是,越来越多研究认为草地流转对草原生态环境改善效果有限,如Li等(2018)采用自然实验的方法,发现流转草地的生物量、植物种类多样性以及土壤有机碳含量等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均发生严重退化;穆钰等(2021)通过案例研究也得到相似结论,这主要归因于转入户以经济利益为中心,一味追求养殖数量增长,从而加剧了草地退化(余露等,2011)。而草场退化的核心问题在于流转草场的产权不安全,难以激励转入户保护草地、交易契约不完善,剩余控制权无法得到优化配置、监管不到位,转出户没有对转入户草场使用行为进行有效监督等(穆钰等,2021;谭淑豪,2020)。可见,当前关于草地流转是否缓解草场压力、抑制超载过牧、保护草原生态环境尚未形成统一结论。事实上,草地流转的“差序格局”可能是致使差异化草场利用结果的原因之一。草地流转并非纯粹市场行为,人格化交易往往不需要市场检验其成效,也不以畜牧业经营利润最大化为唯一目标,而非人格化交易则与之相反。更多关于农(草)地流转“差序格局”对农(牧)户生产决策影响的证据来自农地市场。已有研究表明,农地流转对象以近缘社会关系为主,具有“差序格局”特征(刘瑞峰等,2018),流转契约亦是如此,当与交易对象的血缘或地缘关系越远,农户选择签订书面契约的概率越大(钱龙等,2015)。此外,仇童伟等(2022)研究发现与亲友和本村农户等熟人相比,将农地流转给外村农户或经济组织等非熟人更可能造成“非粮化”生产,原因在于农地租金呈现明显的“差序格局”状态,表征了不同对象之间流转交易的市场化程度。农地租金的提高能够显著增加流转农地“非粮化”的发生概率,一旦熟人间与非熟人间的农地交易租金趋同,则意味着农地流转“差序格局”将逐渐瓦解。

综上,已有研究关于草地流转的经济效果与生态效应评估,均从西方经济学视角考察草地流转如何影响牧户牲畜养殖决策,进而产生差异化的结果,特别是以新古典经济学中理性人假设和利润最大化的目标为出发点,讨论草地流转诱发牧户过度放牧的行为选择,以新制度经济学视角来解释不安全产权、不完善契约和不到位监管导致超载过牧行为的发生,忽视了中国乡土社会“差序格局”特有文化背景下传统人际关系的影响(钱龙等,2015)。诚然,已有文献基于“差序格局”的人情社会特征讨论了社会资本对牧户草地流转行为的作用机理,但并未进一步研究该社会特征下对牧户转入草地后利用行为、养殖决策,乃至是否发生超载过牧行为的影响。当前,在农地流转和草地流转的现实背景下,关于农地流转“差序格局”对农户差异化生产行为的研究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体系,而关于草地流转“差序格局”对牧户差异化放牧行为的研究还较为缺乏,鲜有研究将草地流转“差序格局”特征

纳入到牧户超载过牧的分析框架中,这为本研究提供了进一步拓展的空间。那么,在中国草地流转市场转型期,需要厘清以下几个问题:草地流转“差序格局”与牧户超载过牧的关系如何?作用机制是什么,草地租金是否发挥作用?有何异质性?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有助于清晰地认识草地转入户的牧业生产行为、草地流转的生态环境效应,为进一步推进草地流转制度完善、促进草原生态环境保护等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学决策依据。鉴于此,本文将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利用内蒙古牧区的微观调研数据,验证草地流转“差序格局”与牧户超载过牧的关系,并揭示草地租金在其中的作用机制,讨论具有不同草地资源牧户的异质性结果。主要内容包括:第一,不同草地转入对象是否会伴随着差异化的超载过牧抉择;第二,草地租金的提高是否会加剧牧户超载过牧,以及草地租金在草地流转“差序格局”中是否发挥中间路径作用;第三,具有不同草地资源的牧户,草地流转“差序格局”对其放牧行为的影响是否存在异质性效果。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差序格局”作为解释中国特有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本土社会学理论,最早由费孝通先生提出。他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指出,“我们的社会结构本身和西洋的格局不相同的,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即在乡土中国,人们的行为很大程度上是以“己身”为圈子中心,而“己身”与其他人员之间的亲疏取决于他们与“己身”的距离,距离越远则社会关系越生疏(钱龙等,2015)。在差序格局中,血缘或亲缘成为最稳固的社会关系,个体依亲疏不同由内而外形成层层关联的社会关系网络,构建起己身由“亲”而“信”的乡村内部人际关系交往模式,即形成了与“市场逻辑”陌生人平等交易有所不同的以“熟人社会”信任机制而维系的村庄运行机制(耿鹏鹏等,2022),并依据这种机制进行资源分配。农户的土地流转行为亦是如此(刘瑞峰等,2018)。事实上,中国土地流转并非纯粹是市场逻辑运行的结果,而是掺杂亲缘、地缘和人情关系的特殊市场(罗必良等,2013),并呈现出缔约对象的“差序化”以及流转合约的非正式性等特征(仇童伟等,2022)。聚焦于中国牧区,基于乡土社会“差序格局”的草地流转市场也具有相似的特征(余露等,2011;Qiao等,2018)。草地流转“差序格局”蕴含着两种不同的交易逻辑,一是以血缘、地缘等人情网络关系为主要机制的内圈交易,二是以市场交易为主要机制的外围交易。

就草地流转“差序格局”的内圈交易而言,以人际关系网络为主要互惠机制的流转交易,不完全以追求畜牧业经营利润最大化为主要动机,而是以非正式保障最大化和生存风险最小化为目标(仇童伟等,2022)。在草地流转内圈交易过程中,熟人交易内含信任机制、声誉机制和道德约束等(史雨星等,2023),这具有降低交易成本与规范交易活动的重要作用(耿鹏鹏等,2022)。具体而言,一方面,相较于不熟悉的外来交易者,由血缘、地缘所形成的熟人之间的信任关系更加稳固,牧户更愿意将草地免费或者以较低租金流转给亲朋好友等具有稳固社会关系的主体,由此减少草地转出方就对方违约行为的担忧(特别是转入户过度利用草地),保障草地能够被合理利用,草原生态得到保护,降低超载过牧程度;另一方面,受到村庄内部声誉机制的影响,如果租入方过度利用熟人的草地进行牲畜养殖,甚至超载过牧,就会对草地质量及生态环境造成损害,那么他们的社会声誉将会受到严重影响。因此,从交易双方的行为逻辑看,基于熟人网络的草地流转,其超载过牧程度可能更小。就草地流转“差序格局”的外围交易而言,是要素市场配置为主要方式的流转交易,因稀缺资源的卖方市场特性而出现,需以合约实施风险最小化和谋求畜牧业经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仇童伟等,2022)。在草地流转外围交易过程中,陌生人交易内含了市场交易机制,即对于那些具有扩大牲畜养殖规模动机的转入主体,他们依据市场价格原则,通过支付较高草地租金以租入非熟人的草地。价格作为市场作用

发挥的实现形式和重要信号,一旦价格机制发挥作用,那么交易双方就可能具有明确合约结构的需求,缔约内容涉及流转期限、交易价格等,这无形中增加了交易成本。此时,外围交易中的草地租金和交易费用均较高,以利润最大化为约束目标的租入方将较大概率会增加牲畜养殖数量,必要时进行超载过牧,以提高畜牧业收入。而转出方则以获取草地租金为主要目标,可能会减少对租入方过度利用草地的担忧。据此,从买卖双方的行为动机看,基于非熟人网络的草地流转,其超载过牧程度可能更大。综上,本文提出研究假说1:

H1:草地流转“差序格局”显著影响牧户超载过牧,不同草地转入对象会伴随着差异化结果,即与转出方“差序格局”社会关系越远,牧户超载过牧程度可能会越大。

草地流转“差序格局”内含的个体之间亲疏远近关系也决定了流转市场的交易价格,流转对象的亲疏程度与草地租金具有正向关系,即他们之间关系越疏远,草地流转租金水平就会越高(唐旺等,2023)。这是因为内圈交易中人情关系对价格补偿具有替代作用,而外围交易下这种替代关系被重塑,完全以草地流转市场价格作为交易媒介,租金水平明显升高。但是随着草地流转市场的发育,这种亲疏关系对草地流转租金水平的影响将被削弱,流转的实际租金水平将朝着市场价格收敛(唐旺等,2023),这其中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是草地流转市场化的关键(Qiu等,2021)。在草地流转“差序格局”下,人情关系和租金价格相对重要程度,将作为市场机制效果是否充分发挥的重要表现形式,并决定草地转入对象的行为决策。

事实上,草地流转“差序格局”对牧户牲畜养殖数量的影响是经价格机制实现,即草地租金是草地流转“差序格局”作用发挥的重要渠道(仇童伟等,2022)。具体而言,对于草地流转“差序格局”的内圈交易,如前所述人情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价格补偿,草地流转租金不再以要素配置效率最大化为目标,致使市场价格在草地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减弱,指导畜牧业生产的能力进一步下降,市场检验功能失效。这将使得畜牧业经营利润最大化不再引导租入方的养殖行为。此时,租入方可能会重视草地生态环境,过度放牧的生产行为就会受到抑制。然而,对于草地流转“差序格局”的外围交易,由于草地流转租金是通过市场价格机制决定的,那么此时的要素配置就会符合效率原则。支付高额租金的转入方将以利润最大化和要素配置效率最大化为原则安排畜牧业生产。假定在其他因素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养殖牲畜的边际利润为正,那么势必导致租入方扩大养殖规模,诱发超载过牧的风险。此外,地租挤出效应也会影响转入户的畜牧养殖行为,即一旦草地流转建立在比较高的租金之上,租金上涨将会提高生产经营成本,压缩经营主体利润空间,他们获得的经营性剩余将被挤占,市场作为检验租入主体生产经营绩效的作用就越凸显,这意味着转入主体具有更高的畜牧业收入期望,在有限的草地增加牲畜养殖数量的可能性更大。据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说2:

H2:草地租金是草地流转“差序格局”作用发挥的中间路径,即草地租金的增加会提升牧户超载过牧程度。

此外,具有不同草地资源禀赋的牧户,草地流转“差序格局”对其超载过牧程度可能会产生差异化的影响。根据生产要素配置理论,一方面,对于草地经营面积较大的牧户,他们需要投入更多劳动力、资本、技术等要素资源用于畜牧业生产,那么他们非牧业工作的劳动力和时间投入量将会被替代,这将致使非牧业收入下降,牧户家庭对畜牧业收入依赖性加强(李先东等,2019),牧户牲畜养殖数量更多;另一方面,草地经营面积较大的牧户通常是那些在技术、资本和市场风险应对能力方面更具比较优势的经营主体,草地经营面积扩大有助于其通过技术进步降低畜牧业单位成本,进而形成规模经济(杨宗耀等,2020)。由于技术要素具有不可分性,草地经营面积较大的牧户技术要素投入成本是固定或呈阶梯式增加的,技术投入与草地经营面积没有直接的线性关系(陈雪婷等,2021),但却可以通过增加牲畜养殖数量摊销单位畜牧业技术投入成本。为此,在规模经济的作用下,转入户将扩大牲

畜养殖,甚至超载过牧。特别是在草地流转“差序格局”外围交易下,信任机制和声誉机制等约束作用弱化,转入户更倾向于追求经济利益而不是草地生态环境质量,超载过牧的程度将会变大。此外,草地经营面积较大的牧户转入草地的面积可能更大,需要交付的租金成本更高,为了获得期望的畜牧业收入,则需要提高草地利用强度、增加牲畜养殖数量,也将诱发超载过牧。由此可见,具有不同草地资源禀赋的牧户,草地流转“差序格局”对其超载过牧产生差异化的影响。综上,本文提出研究假设3:

H3:具有不同草地资源的牧户,草地流转“差序格局”对其超载过牧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即相对于草地经营面积较小的牧户而言,草地流转“差序格局”对较大规模的牧户超载过牧程度作用更大。

三、数据来源、变量选择与模型设定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课题组在2022年4—8月于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和呼伦贝尔市牧区的实地调查。内蒙古草原是欧亚大陆草原的重要组成部分,草原面积约占全国草原总面积的22%,是中国主要牧区之一。锡林郭勒盟和呼伦贝尔市的草原类型丰富,从东部到西部主要有草甸草原、典型草原和荒漠草原等,涵盖了内蒙古的主要草地类型(谭仲春等,2018),草原面积分别约占内蒙古草原总面积的32.12%和12.36%,均是较为典型的草原牧区,具有良好的代表性。调查以结构化的入户问卷调查为主,以半结构化访谈作为补充,内容涉及牧户人口学特征、家庭特征、牧业生产信息、草地资源利用情况等。调查采用随机抽样和分层抽样相结合方式,首先,依据地区经济发展情况、区位条件以及草地资源分布等选择锡林郭勒盟的东乌珠穆沁旗、苏尼特左旗和呼伦贝尔市的新巴尔虎右旗、新巴尔虎左旗;其次,根据每个旗(县)牧户规模和草地面积大小选择3~6个苏木(乡镇);再次,按照距乡镇政府的距离远近情况,在每个苏木(乡镇)抽取3~5个嘎查(村);最后,综合考虑草场面积和养殖规模,在每个嘎查(村)抽取8~10个牧户作为调查对象。调查样本中,存在草地租赁行为的牧户共计331户,其中草地转入户322户、转出户9户,结合研究主题,剔除信息缺失严重的样本,本文最终选择319户草地转入户作为分析对象。使用草地转入户作为分析对象的理由如下:牧户牲畜养殖数量与草地面积休戚相关,一方面当其选择放弃牧业生产时,如进城务工等,就可能选择转出草地,此时牧户不再养殖牲畜,也不会存在超载过牧行为;另一方面当牧户自有草地无法满足扩大牧业生产需求时,就会通过转入他人草地以增加可利用草地面积,彼时牧户牲畜养殖行为是可观察的,亦可辨别其是否存在超载过牧行为。诚然,个别牧户家庭承包草地面积较大,而牲畜养殖规模较小,有富裕草地租出,这时家庭养殖行为是可被观测的,有可能发生超载过牧行为。限于上述类型情况极少,本研究样本中该类型牧户仅有9户,故将其剔除。

(二)变量选择

因变量:超载过牧程度。参考高博等(2021)研究,将牧户的实际载畜量与政府厘定的理论载畜量对比,衡量其超载过牧情况。具体做法为,首先,将牧户牲畜按照“1头牛=5个羊单位,1匹马=6个羊单位,1头驴=3个羊单位,1匹骡=5个羊单位,1峰骆驼=7个羊单位”换算为羊单位,得到牧户实际养殖规模,即实际载畜量;其次,根据牧户家庭实际草地经营面积(草地承包面积和草地转入面积之和)与县级政府确定的标准亩系数计算得到理论载畜量;最后,将实际载畜量与理论载畜量相减,得到牧户的超载程度。若该值为正数,说明该牧户存在超载过牧行为,数值越大超载程度越高,反之说明其不存在超载过牧行为。

核心自变量:草地转入对象。如前所述,草地转入对象直观地表征了草地流转的“差序格局”特征。本文参考耿鹏鹏等(2022)的研究,根据问卷中“草地转入对象”的问项结果,将对象区分为熟人

和非熟人。其中,将草地转入对象为亲友或者本嘎查其他牧户设置为熟人,即“差序格局”内圈,将外嘎查牧户或经济组织设置为非熟人,即“差序格局”外围,具体赋值为:非熟人=1,熟人=0。

中介变量:草地租金。本文使用草地转入户支付的亩均草地租金表示。

控制变量。参考已有研究(高博等,2021;王卫东等,2023;钱龙等,2015;刘瑞峰等,2018;王慧等,2023),本文在回归分析中控制了其他可能对牧户超载过牧程度产生影响的因素。一是户主特征。户主作为重要的家庭成员,在家庭分工决策中具有较强话语权,对家庭牲畜养殖情况将会产生重要影响。研究选取户主性别、年龄和受教育年限三个变量作为户主层面的控制变量。二是家庭特征。牧户家庭特征反映了家庭结构和资本禀赋,不同的家庭结构和资本禀赋可能会对牲畜养殖状况产生影响,进而会影响其超载过牧程度。因此,本文选取畜牧业收入占比表征家庭对畜牧业的依赖程度,选取人口抚养比表征家庭的经济负担状况,选取到县城距离表征家庭区位因素,选取家庭成员干部状况和草地经营面积以控制家庭的社会资本和自然资本状况。三是草地流转特征。签订正式书面合同在一定程度上使得牧户草地流转行为具有法律效应,且受到规范与保护,可能会影响到牧户超载过牧行为;而流转期限表征了转入户对流入草场的租用期限,不同期限可能会产生差异化的草场利用强度,从而对牧户超载过牧程度产生影响,所以控制了合约形式和流转期限两个变量。四是区位虚拟变量特征。由于锡林郭勒盟和呼伦贝尔市在经济发展、区位特征、地理环境等方面存在差异,可能会使得牧户畜牧生产情况也存在差异,为控制这一层面的影响因素,本研究控制区域虚拟变量。各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情况如表1所示。

表1 变量说明与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超载过牧程度	实际载畜量与理论载畜量之差	66.5916	237.4633	-796.6700	938.3300
草地转入对象	非熟人=1,熟人=0	0.3981	0.4903	0.0000	1.0000
草地租金	租入草地的亩均租金(元/亩)	11.7354	6.9425	0.0000	45.0000
性别	户主性别:男=1,女=0	0.8150	0.3889	0.0000	1.0000
年龄	户主年龄(岁)	49.8088	10.1007	27.0000	78.0000
受教育年限	户主受教育年限(年)	8.0251	3.4974	0.0000	17.0000
畜牧业收入占比	畜牧业收入占总收入比重	0.7994	0.1903	0.1000	1.0000
人口抚养比	需抚养人口数与家庭总人口之比	0.2711	0.2485	0.0000	0.8000
到县城距离	家庭居住地距县(旗)政府所在地距离(公里)	41.4812	46.3221	1.0000	250.0000
家庭成员干部状况	家庭成员有村干部=1,家庭成员无村干部=0	0.2414	0.4286	0.0000	1.0000
草地经营面积	家庭草地经营面积(亩):草地承包面积与转入面积之和	5113.3160	4508.8630	180.0000	24600.0000
合约形式	书面合同=1,口头协议=0	0.5078	0.5007	0.0000	1.0000
流转期限	草地流转期限(年)	3.2790	1.9604	1.0000	10.0000
区位虚拟变量	锡林郭勒盟=1,呼伦贝尔市=0	0.4013	0.4909	0.0000	1.0000

(三)描述性证据:不同流转对象对应的经济特征

表2汇报了不同草地流转对象对应的经济特征。第一,从草地流转人际关系看,转入对象为亲友或者本嘎查牧户等熟人的比例高达60.1881%,为外嘎查牧户或经济组织等非熟人比例为39.8119%。由此可见,当前草地流转仍然以熟人流转为主。第二,从超载过牧程度情况看,转入对象

为熟人的研究样本中,超载数量均值为-1.3313羊单位,即平均来看没有超载过牧;转入对象为非熟人的研究样本中,超载数量均值为169.2781羊单位。这表明,外围交易中的草地更可能被超载过牧。第三,从草地流转租金看,转入对象为熟人对应的平均草地租金为8.8674元/亩;转入对象为非熟人对应的平均草地租金为16.0712元/亩。由此可见,草地流转“差序格局”的确存在。倘若以熟人之间交易普遍存在的零租金为参考,也表明熟人之间草地流转开始偏离零租金交易(仇童伟等,2022)。

表2 草地转入对象的经济特征

草地转入对象	占样本比重(%)	超载过牧程度(羊单位)	草地租金(元/亩)
熟人	60.1881	-1.3313	8.8674
非熟人	39.8119	169.2781	16.0712

(四) 模型设定

为探究草地流转“差序格局”对牧户超载过牧程度的影响,设置如下模型:

$$Overgrazing_i = \alpha_0 + \alpha_1 Transfer_i + \sigma_i Control + \varepsilon_1 \quad (1)$$

其中, $Overgrazing_i$ 表示第 i 个牧户超载过牧程度情况;核心自变量 $Transfer_i$ 表征草地转入对象,1 表示非熟人,0 代表熟人; $Control$ 为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畜牧业收入占比、人口抚养比、到县城距离、家庭成员干部状况、草地经营面积、合约形式、流转期限、区位虚拟变量; ε_1 表示随机误差项; α_0 、 α_1 和 σ_i 为待估计系数。

为了进一步分析草地租金是否为草地转入对象影响牧户超载过牧的作用路径,参考佟大建等(2023)和顾宁等(2023)的研究,本文采用逐步回归法揭示草地租金在草地流转“差序格局”对牧户超载过牧程度影响中的作用机制,模型如下:

$$Rent_i = \beta_0 + \beta_1 Transfer_i + \delta_i Control + \varepsilon_2 \quad (2)$$

$$Overgrazing_i = \gamma_0 + \gamma_1 Transfer_i + \gamma_2 Rent_i + \varphi_i Control + \varepsilon_3 \quad (3)$$

其中, $Rent_i$ 表示草地租金; ε_2 、 ε_3 表示随机误差项; β_0 、 β_1 、 δ_i 、 γ_0 、 γ_1 、 γ_2 和 φ_i 为待估计系数;其他变量和(1)式一致。此外,由于因变量超载过牧程度和中介变量草地租金均为连续型变量,下文将采用 OLS 模型进行回归,并使用稳健标准误。

四、实证结果分析

结合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本文采用 STATA15.0 对模型进行估计,实证结果如下。

(一) 草地转入对象影响牧户超载过牧的实证结果

1. 基准回归结果。

在表3中,模型(1)仅考察草地转入对象影响牧户超载过牧程度的简化模型,模型(2)是在模型(1)基础上增加控制变量的优化模型。从表3可以看出,无论是否添加控制变量,草地转入对象对牧户超载过牧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具体而言,由表3的模型(2)可知,与亲友或者本嘎查牧户等熟人相比,从外嘎查牧户或经济组织等非熟人转入草地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牧户超载过牧程度,在控制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影响系数为106.0390。这表明,草地流转“差序格局”对牧户超载过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不同草地转入对象会伴随着差异化结果,即与出租方“差序格局”社会关系越远,牧户超载过牧程度越大,H1得到验证。上述发现意味着,相较于陌生的外围交易者,基于血缘和地缘所形成的熟人间的信任关系更为稳固,确实能够降低草地转出方对转入户超载过牧的担忧。

表3 草地转入对象影响牧户超载过牧程度的实证结果

变量	模型(1) 超载过牧程度	模型(2) 超载过牧程度
草地转入对象	170.6094*** (24.7586)	106.0390*** (26.9204)
性别		15.5116 (23.5871)
年龄		-0.7807 (1.0101)
受教育年限		0.3954 (3.7046)
畜牧业收入占比		80.2199 (51.3663)
人口抚养比		100.6905** (44.0647)
到县城距离		0.5252* (0.2722)
家庭成员干部状况		101.1910*** (27.2966)
草地经营面积		-0.0289*** (0.0032)
合约形式		-8.3411 (21.6319)
流转期限		5.7875 (5.4448)
区位虚拟变量		8.6636 (20.4761)
常数项	-1.3313 (16.8954)	39.2767 (101.8074)
F统计量	47.4846	17.0021
Prob>F	0.0000	0.0000
R ²	0.1241	0.4507
样本量	319	319

注：*、**、*** 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值为异方差稳健标准误。下同

由于草原生态退化的压力,草地流转不仅肩负畜牧业发展的生产性功能,还承担降低牧户超载过牧程度,缓解草原退化的生态性功能。然而,当前中国草地流转市场尚未完善,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引致的潜在违约风险(特别是转入户过度利用草地)和交易成本是影响草地流转交易行为能否达成的关键(史雨星等,2022;石晓平等,2023)。在对交易行为进行现代经济分析时,通常是以新古典经济中的理性人假设和利润最大化目标为出发点,但中国传统村庄(嘎查)内的经济行为并非简单的市场逻辑(耿鹏鹏等,2022)。事实上,研究表明,基于“差序格局”的牧区社会,草地流转往往伴随口头合约、低租金等非市场化特征。这种交易行为并不是按照市场原则发生,交易双方不完全以畜牧业经营利润最大化做为唯一目标,由此使得转入户的畜牧业生产行为不需要经过市场的严格检验。此外,熟人间的信任机制、声誉机制和道德约束等发挥着规范交易活动、降低草地利用强度和减少超载过牧程度的重要作用。综上,基于“差序格局”内圈的人格化草地流转,其导致超载过牧程度更小。

这意味着,“差序格局”的关系机制与熟人社会的信任机制,能够作为在以草地流转为实现路径,推动草原生态恢复时的重要组织资源。

在其他控制变量中,人口抚养比在 5%水平上对牧户超载过牧程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可能的原因是家庭人口抚养比表征了经济负担状况。在牧区牧户家庭收入高度依赖畜牧业,家庭抚养比越大,则依赖程度越高,牲畜养殖数量就可能越多,超载过牧程度就会越大。到县城距离在 10%水平上对牧户超载过牧程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可能是因为距离县城越远的牧户被监管的力度和频率相对较低,超载过牧程度可能会越大。家庭成员干部状况在 1%水平上对牧户超载过牧程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可能的原因是家庭成员干部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家庭于所在嘎查(村)的社会资本情况,社会资本越强越容易获得草地租赁信息,并且村干部的家庭经济条件一般要比嘎查(村)其他牧户更好,支付的草地租金可能更高,故而超载过牧程度会更大。草地经营面积在 1%水平上对牧户超载过牧程度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是因为在其他投入要素不变的情况下,家庭实际草地经营面积越大,牧户可利用的草场资源越多,其超载过牧的程度越小。

2. 稳健性检验。

(1)缩尾检验。参考魏立乾等(2022),对样本中连续变量进行 1%的异常值缩尾处理,检验模型回归结果的稳健性,回归结果见表 4 中模型(3)。模型(3)回归结果表明草地流转“差序格局”对牧户超载过牧程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与表 3 中模型(2)回归结果一致。可见,文章对样本进行缩尾处理并未干扰模型结果的稳健性。

(2)替换变量。本部分通过替换因变量“超载过牧”的测量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即用“是否超载过牧(超载=1;不超载=0)”替代“超载过牧程度”,并用 Probit 模型进行回归,结果见表 4 的模型(4)。模型(4)回归结果表明在控制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与亲友或本嘎查牧户等熟人相比,从非熟人转入草场,牧户超载过牧概率更大,与表 3 中模型(2)回归结果一致。可见,文章对因变量进行替换并未干扰结论的稳健性。

表 4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模型(3) 超载过牧程度	模型(4) 是否超载过牧
草地转入对象	106.8288*** (26.3830)	0.9176*** (0.2457)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43.4538 (98.5897)	0.7139 (0.8004)
F 统计量	17.7962	—
Prob > F	0.0000	—
R ²	0.4543	—
Log pseudo likelihood	—	-120.3078
Wald 统计量	—	82.6036
Prob>chi2	—	0.0000
调整 R ²	—	0.3751
样本量	319	319

3. 内生性处理。

本文在模型估计中可能会面临内生性问题,考虑如下两点:第一,嘎查(村)内部不同牧户的草地转入对象可能会受到超载过牧程度的影响,从而导致“反向因果”关系;第二,可能存在遗漏同时作用于草地转入对象与超载过牧程度变量的情况。借鉴仇童伟等(2022)、马俊凯等(2023)的做法,本文使用嘎查(村)草地流转市场的发育状况作为牧户流转行为的工具变量,用本嘎查(村)其他牧户的草地转入对象均值来刻画,并进行2SLS回归,结果见表5。嘎查(村)层面的草地流转具有一定聚类效应,即如果嘎查(村)内部草地流转以熟人交易为主,那么转入户更可能从熟人租入草地,反之亦然,可见个体的草场流转行为与嘎查(村)内部草地流转市场的发育状况存在相关性;但却并不会直接影响到牧户超载过牧情况,具有良好的外生性。由表5可知,第一阶段估计结果表明嘎查(村)草地流转市场的发育状况在1%的水平上对草地转入对象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第一阶段的F值为209.9250大于10,拒绝“存在弱工具变量”的原假设,表明本文所选工具变量具有适用性;第二阶段估计结果表明草地转入对象在1%的水平上对牧户超载过牧程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与前文研究结论一致。

表5 内生性处理检验结果

变量	第一阶段 草地转入对象	第二阶段 超载过牧程度
草地转入对象	—	149.6614*** (38.6533)
嘎查(村)草地流转市场的发育状况	0.7306*** (0.0504)	—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0.1106 (0.1656)	37.2012 (102.0092)
第一阶段F值	209.9250	—
R ²	0.6260	0.4455
样本量	319	319

(二) 机制分析和异质性检验

1. 草地转入对象影响牧户超载过牧内在机理的实证结果。

根据前文理论分析,为探究草地转入对象影响牧户超载过牧的内在机理,本部分将草地租金作为中介变量,采用逐步回归法检验草地租金是否在草地流转“差序格局”中发挥路径作用,相关回归结果见表6模型(5)~(7)。模型(5)估计结果表明,草地转入对象对牧户超载过牧程度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模型(6)估计结果表明,草地流转“差序格局”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草地租金,在控制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影响系数为5.0434。该研究结果的经济学含义是,与亲友或本嘎查牧户等熟人相比,从外嘎查牧户或经济组织等非熟人转入草地时流转租金明显提高。这是由于“差序格局”下的外围交易打破了原有的人情关系网络,进而促进草地流转市场价格机制形成,提升了草地的流转租金。模型(7)是在模型(5)的基础上加入草地租金中介变量,估计结果表明,草地租金在10%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牧户超载过牧程度,即草地租金的增加提高了转入户的超载过牧程度,符合预期。同时,草地转入对象依然在1%的水平上对牧户超载过牧程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这表明草地租金的中介作用存在。综合模型(5)~(7)的估计结果,可以发现,草地租金是草地流转“差序格局”作用发挥

的中间路径,H2 得到验证。这说明生产资料的使用价值与交易价值具有高度正相关关系,草地使用价值的提高与产出畜产品的价值直接相关联(仇童伟等,2022)。交易价格即草地流转价格越高,以利润最大化为约束目标的转入方将会增加牲畜养殖数量以实现畜牧业经营的收入期望,牧户超载过牧程度会更大。

表 6 草地转入对象影响牧户超载过牧内在机理与异质性的实证结果

变量	模型(5) 超载过牧程度	模型(6) 草地租金	模型(7) 超载过牧程度	模型(8) 超载过牧程度
草地转入对象	106.0390*** (26.9204)	5.0434*** (0.8365)	87.3233*** (28.1801)	118.5044*** (29.6797)
草地租金	—	—	3.7109* (1.9651)	—
草地转入对象×草地经营面积	—	—	—	0.0149* (0.0085)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39.2767 (101.8074)	5.1116* (2.6315)	20.3078 (102.3133)	74.0741 (103.5897)
F 统计量	17.0021	23.5798	17.1388	17.0182
Prob>F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R ²	0.4507	0.3905	0.4579	0.4636
样本量	319	319	319	319

事实上,草地流转市场发育越完善,血缘和地缘关系对草地租金的影响就会越弱(唐旺等,2023)。这意味着在草地流转市场化的冲击下,人情机制将在很大程度被价格机制所代替,理性的草地出租者将在价格机制的引导下将草地流转至出价高的牧户,即价高者得。研究结果表明,草地流转价格的提高,隐含着转入户生产经营绩效受市场检验的压力增加,在其他因素保持不变的情况下,若养殖牲畜的边际利润为正,那么势必导致转入方提高草地利用强度,加大牲畜养殖规模。本质上,草地流转的“差序格局”是由市场机制作用发挥的相对大小决定的,流转价格是草地流转对象作用发挥的重要机制(仇童伟等,2022),也是诱发牧户超载过牧的关键因素。因此,在以草地流转为实现路径推动草原生态恢复时,要规范交易价格。

2. 草地转入对象影响牧户超载过牧的异质性实证结果。

基于前文理论分析,本部分从牧户家庭草地经营面积出发,探究草地流转“差序格局”对其超载过牧的影响是否存在异质性。参考魏立乾等(2022)和高亚飞等(2023)的研究,使用交互项检验方法,探究草地流转“差序格局”影响牧户超载过牧的异质性情况。为了避免潜在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对交互项中的草地经营面积进行去中心化处理。根据表 6 模型(8)回归结果可知,草地转入对象与草地经营面积的交互项对牧户超载过牧程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该研究结果的经济学含义是草地转入对象对牧户超载过牧程度的影响随着家庭草地经营规模增加而扩大。由此可见,具有不同草地资源的牧户,草地流转“差序格局”对其超载过牧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即相对于草地经营面积较小的牧户,草地流转“差序格局”对较大规模的牧户超载过牧程度作用效果更明显,H3 得到验证。可能的原因是,对于草地经营面积较大的牧户,根据生产要素配置理论,他们此时需要在畜牧业生产中的投入更多的劳动力、资本、技术和时间等,将挤占其非牧就业机会,导致工资性收入下降(张广辉等,2023),提高了牧户家庭对畜牧业收入依赖程度,尤其在草地流转“差序格局”外围交易下,转入户更

倾向于追求经济利益,牲畜养殖数量也随之增加更多。通过对样本进一步分析,将草地经营面积与样本均值对比,均值之上的牧户定义为大规模户,均值及以下的牧户定义为小规模户,可以发现小规模牧户家庭畜牧业收入占总收入比重均值为77.5%,而大规模牧户家庭畜牧业收入占总收入比重均值为84.4%,高于小规模牧户6.9个百分点。畜牧业收入占比越高,则依赖程度越强,牲畜养殖数量就会越多,超载过牧程度越大。

当前,虽然在牧区草地流转政策中,鼓励草地资源向养殖大户、家庭牧场、牧业企业等新型牧业经营主体流转已成为支持和引导的方向(史雨星等,2023),但本文研究结果表明,草地转入对象对牧户超载过牧的影响具有异质性,草地经营面积较大规模的牧户超载过牧程度要高于小规模牧户,且一般而言新型牧业经营主体多为大规模户,这意味着在以草地流转为实现路径,推动草原生态恢复时,要规范新型牧业经营主体草地流转与使用行为,并加强放牧强度监督。

(三)进一步讨论:市场化转型与草地流转“差序格局”撕裂

前文分析可知,草地流转“差序格局”是由人情关系和 market 价格的相对重要性(即是否作为主要交易机制)决定的,那么草地租金的相对高低可以作为衡量市场机制是否有效运行的关键指标。任何不以市场价格作为主要机制的草地流转均不被视为“要素型”市场,而被认为是“关系型”市场,是一种非市场型交易或市场化程度较低的交易(仇童伟等,2022)。然而,当前中国牧区社会关系正在嬗变^①,推动草地流转市场化快速转型,可能致使草地流转“差序格局”发生撕裂。这种草地流转“差序格局”撕裂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传统的以熟人交易和口头承诺为主要特征的“关系型”市场逐步瓦解,正在向以非熟人和契约关系为主要特征的“要素型”市场转变(史雨星等,2023);二是草地流转即便是发生在熟人间的交易,市场化特征也更加明显,价格机制发挥更重要作用,即熟人间的与非熟人间的草地租金将逐步趋同(史雨星等,2022)。按照该逻辑,草地流转“差序格局”中的人际关系元素将逐渐被草地租金所取代,要素配置就会更加符合效率原则,进而形成由市场决定牧户生产行为的局面,草地转入方将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进行养殖决策,扩大牲畜养殖规模的概率更高,超载过牧程度可能更大。值得注意的是,当前草地流转仍然以熟人流转为主,如果熟人交易的市场化程度持续提高,且草地租金仍然保持上涨趋势,那么牲畜养殖数量将有可能持续增加,草地生态环境压力也将随之增加。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在中国“三权分置”改革大力推进草地流转的背景下,已有研究对于草地流转是否会导致牧户超载过牧,进而加剧草地退化,阻碍草原生态环境恢复存在较大争议,并多从西方经济学“理性人假设”视角考察草地流转如何影响牧户放牧行为,鲜有考虑中国乡土社会“差序格局”下人情关系的作用发挥。由于忽视了交易对象和草地租金的重要影响,从而难以充分理解草地流转市场化过程中牧户放牧行为的内在机理。为此,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利用内蒙古牧区319户草地转入牧户的微观调查数据,验证草地流转“差序格局”与牧户超载过牧的关系,并进一步讨论了“市场化转型与草地流转‘差序格局’撕裂”可能潜在的问题,研究结论如下:(1)与亲友或者本嘎查牧户等熟人相比,从外嘎查牧户或经济组织等非熟人转入草地牧户超载过牧程度明显增加。从边际效应系数看,在控制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从非熟人转入草地,牧户超载过牧程度平均增加106.0390个羊单位;(2)机制检验表明,草地流转“差序格局”显著正向影响草地流转租金,而草地租金的提高会增加转入户超载过牧

^① “双权一制”改革以来,受牧户定居、分散经营以及市场化等的熏染,牧户逐渐呈现“原子化”特征,人际关系则由传统的互惠关系向经济利益关系转变(史雨星,2022)

程度,即草地租金是草地流转“差序格局”作用发挥的重要途径;(3)异质性分析表明,具有不同草地资源的牧户,草地流转“差序格局”对其超载过牧的影响存在异质性,相对于草地经营面积较小的牧户,草地流转“差序格局”对较大规模的牧户超载过牧程度作用更加凸显;(4)当前草地流转市场化快速转型,加之业已出现的草地租金趋同,意味着草地流转“差序格局”将逐渐发生撕裂,并可能导致牧户超载过牧,加大草地生态环境压力。

根据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一是完善草地流转制度,加强对转入草地牧户超载过牧的监管,尤其需要关注“差序格局”外围交易的牧户。具体而言,要大力推进草地流转备案登记工作(冯晓龙等,2021),以嘎查为单位,要求草地流转双方到村委会进行登记备案,对转入草地的流转范围、流转规模、流转双方权利和义务等信息进行详细记录,特别是要明确草地合理利用的具体要求,对违规超载放牧行为规定责任条款。要求草地转出户要对转入户放牧行为进行监督,一旦发生超载过牧、破坏生态环境行为共同追责。二是优化草地流转市场交易机制,规范草地流转价格秩序。一方面通过建立和完善“村—镇—县”三级草地流转市场网络信息服务平台,及时公布草地流转参考价格,避免信息不对称,造成转出方漫天要价行为;另一方面基于外部性理论,如果以期通过草地流转实现草原生态保护的目标,则需要对草地转入户给予一定的流转补贴,减轻其支付租金压力。三是合理、审慎推进牧区适度规模经营,不可盲目主导草地资源向养殖大户、家庭牧场、牧业企业等新型牧业经营主体流转,他们的草地经营面积更大,支付的流转租金更多,也更倾向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指导牧业生产,超载过牧程度可能更大。四是考虑到当前草地流转仍然以熟人流转为主,草地流转“差序格局”撕裂及其潜在的问题应引起相关政府部门的关注。在推进草地流转市场化的进程中,兼顾乡土社会中的传统习俗在文化建构、社区关系维护和草原生态保护中的积极作用。

参 考 文 献

1. Li, A., Wu, J. G., Zhang, X. Y., et al. China's New Rural "Separating Three Property Rights" Land Reform Results in Grassland Degradation: Evidence From Inner Mongolia. *Land Use Policy*, 2018, 71: 170~182
2. Qiao, G. H., Zhang, B., Zhang, Jing., et al. Land Rental, Prices and the Management of China's Grasslands: The Case of Inner Mongolia Autonomous Region. *The Rangeland Journal*, 2018(3): 231~240
3. Qiu, T. W., Luo, B. L., Geng, P. P., et al. Market-oriented Land Rentals in the Less-developed Regions of China. *Applied Economics Letters*, 2021(11): 945~948
4. Tan, S. H., Liu, B., Zhang, Q. Y., et al. Understanding Grassland Rental Markets and Their Determinants in Eastern Inner Mongolia, PR China. *Land Use Policy*, 2017, 67: 733~741
5. Yang, S. S., Yu, L., Leng, G. X., et al. Livestock Farmers' Perception and Adaptation to Climate Change: Panel Evidence From Pastoral Areas in China. *Climatic Change*, 2021, 164: 1~24
6. 陈雪婷,冯中朝,黄炜虹,齐振宏,杨彩艳. 经营规模对农户异质性生态生产行为的影响研究.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2021(5): 1252~1263
7. 仇童伟,罗必良. 流转“差序格局”撕裂与农地“非粮化”:基于中国29省调查的证据. *管理世界*, 2022(9): 96~113
8. 费孝通. *乡土中国*. 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3
9. 冯晓龙,苏柳方,唐建军. 草场流转备案、流转范围规制与牧户超载过牧行为. *农业技术经济*, 2021(12): 4~16
10. 高博,马如意,乔光华. 草原补奖政策:“高满意度与低执行度”悖论的形成机理研究. *农业技术经济*, 2021(2): 112~122
11. 高芬,周杰,李秋波,张立中. 草地流转、牧民收入增长及收入差距——基于内蒙古微观调研数据. *中国草地学报*, 2022(11): 92~103
12. 高亚飞,关皓天,秦朗. 数字经济对农业转移人口和城市人口收入差距的影响. *农业技术经济*, 2023(9): 54~69
13. 耿鹏鹏,罗必良. 农地确权是否推进了乡村治理的现代化. *管理世界*, 2022(12): 59~76
14. 顾宁,李颜汝. 农村土地流转、农民收入结构与相对贫困治理. *农业技术经济*, 2023(10): 62~78
15. 关士琪,赵孟琳,唐增,李国梅,张岩,杨全俊. 草地流转的收入效应——来自青藏高原牧区的证据.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23(3):1~8

16. 胡振通,孔德帅,焦金寿,靳乐山. 草场流转的生态环境效率——基于内蒙古甘肃两省份的实证研究. 农业经济问题,2014(6):90~97
17. 孔德帅,胡振通,靳乐山. 牧民草原畜牧业经营代际传递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内蒙古自治区34个嘎查的调查. 中国农村观察,2016(1):75~85
18. 赖玉珮,李文军. 草场流转对干旱半干旱地区草原生态和牧民生计影响研究——以呼伦贝尔市新巴尔虎右旗M嘎查为例. 资源科学,2012(6):1039~1048
19. 李先东,李录堂,苏岚岚,夏咏. 牧民草场流转的收入效应分析. 农业技术经济,2019(11):104~115
20. 刘博,谭淑豪. 社会资本与年轻牧民草地租赁行为.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19(6):46~54
21. 刘瑞峰,梁飞,王文超,马恒运. 农村土地流转差序格局形成及政策调整方向——基于合约特征和属性的联合考察. 农业技术经济,2018(4):27~43
22. 罗必良,刘茜. 农地流转纠纷:基于合约视角的分析——来自广东省的农户问卷. 广东社会科学,2013(1):35~44
23. 马俊凯,李光泗. 农地确权、要素配置与种植结构:“非粮化”抑或“趋粮化”. 农业技术经济,2023(5):36~48
24. 穆钰,姝苏,李文军. 草场流转对牧民生计和草原生态保护的影响分析——基于锡林郭勒盟镶黄旗的案例研究. 中国草地学报,2021(11):84~96
25. 钱琛,邵砾群,王帅,张会,陈海滨. 社会网络对牧户草地租入行为的影响——以青海省门源县4个村为例. 资源科学,2021(2):269~279
26. 钱龙,洪名勇,龚丽娟,钱泽森. 差序格局、利益取向与农户土地流转契约选择.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5(12):95~104
27. 石晓平,关长坤,于博源. 农地确权如何弱化农地流转的熟人化特征——基于交易费用的中介效应分析. 农业技术经济, <https://doi.org/10.13246/j.cnki.jae.20231201.001>
28. 史雨星,赵敏娟. 关系网络、社会互动与牧户草场转入行为——草场流转市场转型期社会资本作用的再审视. 农业技术经济,2023(1):45~59
29. 史雨星,赵敏娟. 社会资本、信息渠道对牧户草场转入行为的影响——基于草场流转市场转型背景的分析.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1):115~128
30. 史雨星. 牧户草场转入及其对畜牧业经营可持续性的影响研究.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22
31. 苏柳方,仇焕广,唐建军. 草场流转的转入地悲剧——来自876个草场地块的微观证据. 中国农村经济,2021(3):68~85
32. 谭淑豪. 牧业制度变迁对草地退化的影响及其路径. 农业经济问题,2020(2):115~125
33. 谭仲春,谭淑豪. 草地流转与牧户效率:“能人”效应还是“资源平衡”效应.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8(3):76~85
34. 唐旺,周聪,陈风波. 农地市场发育与人情租金收敛——基于南方稻农地块层次数据的研究. 农业技术经济,2023(6):35~49
35. 佟大建,张湖沿,应瑞瑶.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城市融入与农民工城市居留意愿. 农业技术经济,2023(10):79~94
36. 王慧,杜富林. 牧户经营规模对综合效率与经营效益影响的实证研究——以典型草原地区为例. 农业技术经济,2023(8):100~112
37. 王卫东,王术坤,刘敏,仇焕广. 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减畜效应研究——来自牧区的经验证据. 农业技术经济, <https://doi.org/10.13246/j.cnki.jae.20230217.001>
38. 魏立乾,王亚平,罗剑朝. 家庭禀赋、政策认知与农业信用担保融资约束——基于陕西、宁夏765份农户调查数据. 农业技术经济,2022(12):100~115
39. 杨宗耀,仇焕广,纪月清. 土地流转背景下农户经营规模与土地生产率关系再审视——来自固定粮农和地块的证据. 农业经济问题,2020(4):37~48
40. 余露,汪兰溪. 探索牧区草场流转发展之路——以宁夏盐池牧区为例. 农业经济问题,2011(4):105~109
41. 张广辉,张健. 农村土地流转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内在机理与实证检验. 经济学家,2023(2):120~128
42. 张美艳,张立中,韦敬楠,辛妹玉. 锡林郭勒盟草原流转驱动因素的实证研究.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17(3):57~63
43. 周升强,赵凯.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户减畜行为的影响——基于非农牧就业调解效应的分析. 农业经济问题,2019(11):108~121

Grassland Transfer “Orderly-diversity Pattern” and Herdsman Overgrazing: Micro Evidence from Pastoral Areas in Inner Mongolia

MA Ruyi, XIAO Haifeng, GAO Bo, QIAO Guanghua

Abstract: Whether grassland transfer will lead to the overgrazing of herdsmen, which will further aggravate grassland degradation and hinder the restoration of grassl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s widely debated in the academic circles. This paper uses the concept of “orderly-diversity pattern” of grassland transfer to distinguish grassland-trading entities. Based on theoretical analysis, it uses the microscopic survey data of pastoral households in Inner Mongolia to verif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orderly-diversity pattern” of grassland transfer and overgrazing of herdsmen. The paper further discusses the potential problems of the market-oriented transformation and the “orderly-diversity pattern” of grassland transfer.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show that: (1) Compared with relatives and friends or acquaintances such as herdsmen in the same Gacha, the transfer of grassland from non-acquaintances such as herdsmen or economic organizations from outside Gacha is more likely to cause the degree of overgrazing by herdsmen. (2) The mechanism test shows that the “orderly-diversity pattern” of grassland transfer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affects the rent of grassland transfer, and the increase of grassland rent will increase the degree of overgrazing, that is, the grassland rent is the major path for the effect of the “orderly-diversity pattern” of grassland transfer to play. (3) The analysis of heterogeneity shows that for herdsmen with different grassland resources, the influence of “orderly-diversity pattern” of grassland transfer on their overgrazing is heterogeneous. The “orderly-diversity pattern” of grassland transfer has a greater effect on the larger-scale herdsmen’s degree of overgrazing. (4) The current market-oriented rapid transformation of grassland transfer, coupled with the convergence of grassland rents that have already occurred, means that the “orderly-diversity pattern” of grassland transfer will gradually tear apart, and may lead to overgrazing of herdsmen, increasing the pressure on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f grasslands. Considering that the current grassland transfer is still dominated by acquaintances, the tearing of the “orderly-diversity pattern” of grassland transfers and its potential problems should arouse the attention of relevant government departments.

Keywords: Grassland transfer; Overgrazing; “Orderly-diversity Pattern”; Grassland rent; Marketization

责任编辑:段艳艳